

中國學研究



Sinology Studies

第十四輯

吳兆路 甲斐勝二(日本) 林俊相(韓國) 主編



● 濟南出版社

中國學研究

(第十四輯)

吳兆路 甲斐勝二(日本) 林俊相(韓國) 主編

復旦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 主辦

濟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研究. 第十四辑/吴兆路,(日)甲斐胜二,
(韩)林俊相主编.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88-0320-1

I. ①中… II. ①吴… ②甲… ③林… III. ①汉学—
文集 VI. ①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8819号

封面题字 冈村繁(日本)

责任编辑 朱向泓 朱琦

责任审校 王淑新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0531)86131727 86131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85×26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70千字

定 价 2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88-0320-1

中国学研究

(第十四辑)

学术顾问 王运熙 顾易生 王水照 潘富恩 黄霖 冈村繁(日本)
清水凯夫(日本) 崔溶澈(韩国) 杨端志

主 编 吴兆路 甲斐胜二(日本) 林俊相(韩国)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杜晓勤(北京大学)
方 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甲斐胜二(日本福岡大学)
雷恩海(兰州大学)	罗剑波(复旦大学)
朴均雨(韩国原州大学)	任元彬(韩国外国语大学)
孙明君(清华大学)	吴兆路(复旦大学)
张 兵(复旦大学)	

执行主编 丁少伦 吴兆路

责任编辑 朱向泓 朱 琦

责任审校 王淑新

封面题字 冈村繁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印刷监制 郭建业

卷首语

《中国学研究》自1998年创刊发行以来,得到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肯定,其影响远播世界各地。从本期开始,《中国学研究》重新改版,使之成为一种更加新颖别致、美观大气的专业性学术刊物。这是一种高档次、高品位且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辑。当然,这类专辑的出版,如果没有国内外一些师友的积极鼓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恐怕是很困难的。值此,我们真诚地说声“谢谢”。

《中国学研究》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其撰写人员遍及世界各地,一般是博士毕业或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大学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在中国留学即将毕业的国外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也在遴选之列。稿件一般由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送请有关专家预审。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中国学研究》犹如一个窗口,为我们了解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作为编撰者,我们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风格。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征集渠道还不是特别畅通,所以对有些优秀论文不能入选也深表惋惜。本专辑今后将注意扩大国别区域的覆盖面,增强精品意识,多发表一些功底深厚、富有创见、新颖独特的好文章,以繁荣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国学研究》目前暂定为每年出版一辑,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稿件。稿件一般限于一万字之内,并请提供电子文档和打印稿,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国内联系人:吴兆路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邮编:200433)

E-mail: zhaoluwu@fudan.edu.cn

国外联系人:甲斐胜二

通讯地址:日本〒814 福岡大学人文学部

E-mail: kaika@fukuoka-u.ac.jp

目 录

专家论坛

- 1 印度佛教故事口传入华之途径及语言交际 / 陈引驰
- 13 从高启赠答诗看其生活经历及心态变化 / 贾舒颖
- 19 论郑恒形象的演变对西厢故事的影响 / 韦珮华(中国香港)
- 27 从传奇到民歌
——以西厢故事为中心 / 黄冬柏(日本)
- 36 中印古典诗韵论的诗法表现
——从中印两个诗学命题谈起 / 程晶晶

古代文艺思想研究

- 42 论“登高能赋” / 李 英
- 47 钟嵘诗学命题“文已尽而意有余”说探微 / 刘 俊 吴建民
- 51 “文以载道”与“审美直观”
——唐顺之文艺思想的叔本华哲学、美学批判 / 岳宇阳
- 59 沈周诗学思想初探 / 汤志波
- 64 近代报刊诗话对传统诗话的继承和嬗变 / 李德强
- 71 论中国中世文学中诗歌色彩语言的嬗变 / 张 羽

古今文学演变研究

- 76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考解
——再论乐府诗的拼凑与割裂 / 吴伯雄
- 81 试论孙绰诗文中三教杂糅之现象
——以《游天台山赋》为例 / 马 杰
- 88 楚雨含情皆有托?
——李商隐女性爱情诗新探 / 王凌靓华(美国 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
- 96 论温庭筠的仕途追求及咏史诗传作 / 万国花
- 100 《和陶集》与中年张岱的图像重构 / 张海新
- 108 明末清初世变文学之余怀个案研究 / 毛文琦
- 115 论王熙凤的哭 / 罗 菲
- 121 抒写人性的大众文学
——浅论金庸的文学观 / 缪丽芳
- 128 《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与美国动漫
——电影拍摄的灵感从哪里来 / 乔西 Jossalberto Briceño Sáenz(墨西哥)

儒道思想文化研究

- 133 孔子论“君子病无能”与曹雪芹的“补天”思想 / 刘 铭
139 庄子濠梁之辩的主体间性美学解读 / 鲍俊晓
145 从儒农之争管窥先秦农家思想 / 李 璞
151 钱穆的儒家立场
——读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 吴 湛

语言学研究

- 156 从异体字“裏”与“里”以及“裡1”与“裡2”的用法看《三国志演义》早期文本
——以“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本之比对”为中心 / 闵庚旭(韩国)
160 山东邹平方言里的“喽”[lɔ]的用法和分布 / 李于虎
164 《论语》“敏”含义考释 / 李 果
168 从《孟子》看《汉语大词典》的词条失收问题 / 黄修志
174 从爱德华·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阐释看《武林外传》 / 唐柳金

文献与考证

- 178 《四部丛刊》本《眉山唐先生文集》校读札记 / 张 霞
185 从文献学角度看《中国文学史新著》 / 杜怡顺
196 元代诗人黄玠生卒年考
——附考“王玠”等著录之误 / 侯荣川
199 顾起元生平履历钩沉及卒年考证 / 龙 野
205 对《南山集》案起因新见 / 刘文彬
210 金匱秘藏一朝见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评述 / 颜敏翔
214 读《四库提要》史部载记类《华阳国志》 / 万曼璐

文化人类学研究

- 220 周必大两次宫观心境解读 / 綦晓芹
225 社会记忆的重塑
——从孟姜女传说中“哭”这一情节的演变谈起 / 俞 蓓
231 论陈三立人品、诗品之高洁
——以咏雪诗为例 / 张 煜
241 成长与政治化表达
——论传记片的成长叙事修辞 / 吴凑春
247 高密扑灰年画的文化人类学的解读 / 刘海鹏

中国文化在国外

- 252 “女子无才便是德”之后
——中国女子教育的变迁(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 市成直子(日本)
263 日本学界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综述 / 林晓光



印度佛教故事口传入华之途径及语言交际

●陈引驰*

摘要:佛教流传中国,在中古时代的叙事文学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迹,这种影响的实现,除了经典文本的译入和传播,还有口传的途径,这在中古时期西行求法僧人留下的著述中可得而窥。本文提示此一途径,更进而以相关文献,试图勾勒西行求法僧人实现佛教故事口传入华的语言交际之条件等问题。

关键词:佛教故事 口传途径 西行僧人 梵语 语言交际

中古时期,佛教信徒西行求法,为数甚多。魏晋六朝时代,未见梳理;至于唐代,则有义净名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义净此书,不同于采辑史料编缀而成的僧传,而是胪列其游历过程中见闻的五十年间之西行求法僧人,颇类游历纪录的一部分。确实,西行求法之僧人,不仅以求取经典为限,且往往撰写行纪,记录旅途之曲折、沿路之见闻,如东晋法显之《法显传》、唐代玄奘之《大唐西域记》自是其中最著名者;其有片断文字留存后世,如《洛阳伽蓝记》所录宋云等行记、敦煌出土慧超之《往五天竺国传》^①之类,亦堪珍贵。更有散佚失传、今日难睹芳容的篇什,如宝云“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逾雪岭,勤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其所造外国,别有记传,征士豫章雷次宗为其传序”;^②法勇于刘宋太初元年时至天竺,陆去海还,“所历事迹,别有记传”,^③而据《大唐内典录》卷四,有法勇《外国传》五卷;道普受刘宋太祖之资助,“经游西域,遍历诸国……游履异域,别有大传。时高昌复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四卷”。^④

西游行记,既出僧人之手,所载西域、天竺见闻,自以佛教胜迹与佛教掌故为多,其中不乏曲折离奇、生动感人之段落,宗教旨趣之外,饶有文学意味,更有因而流衍东土,蔚为大观之例,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所载婆罗痾斯国“烈士池”之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文系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古佛教学、道家思想与文学等方面,有《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等多种专著。

①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②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宝云法师传》,苏晋仁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8~579页。

③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勇法师传》,苏晋仁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81~582页。同卷《智猛法师传》记智猛西行天竺,返回后,于元嘉“十六年七月七日于钟山定林寺造传”,亦当是游历记传一类著述。观法勇、智猛二传,颇多路途艰险之描写形容,疑即出自述记传,尤其智猛传中叙鬬宾见闻,有“具在其传”之语,可为的证。

④ 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0~81页。

传说,先后形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谪》“顾玄绩”、李复言《续玄怪录》“杜子春”(《太平广记》卷十六)、薛渔思《河东记》“萧洞玄”(《太平广记》卷四十四)、裴铏《传奇》“韦自东”(《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六)乃至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人长安》等一系列文学文本。^① 西游行记中故事,即使与传译经典记叙大致类同者,亦因行记特质,透露了明确具体的地域空间信息,故而可据以推定佛经物语之空间分布及流播,此亦故事学研究不可付诸阙如的方面。如《杂宝藏经》卷一之《鹿女夫人缘》及《莲花夫人缘》大抵为一事二传,与《法显传》载“放弓仗塔”故事及《大唐西域记》卷七所记相较,实属同一源流,兹录中土两书文字如次:

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此名者,恒水上流有一国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特,王即取养之。遂使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言:“王勿愁忧!但于城东作高楼,贼来时,置我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贼到时,小夫人于楼上语贼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仰向张口。”小夫人即以两手拘两乳,乳各作五百道,堕千子口中。贼知是母,即放弓仗。^②

告涅槃期侧不远有窳堵波,千子见父母处也。昔有仙人隐居岩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麋鹿随饮,感生女子,姿貌过人,唯脚似鹿。仙人见已,收而养焉。其后命令求火,至余仙庐,足所履地,迹有莲华。彼仙见已,深以奇之,令其绕庐,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还。时梵豫王畋游见华,寻迹以求,悦其奇怪,同载而返。相师占言。当生千子。余妇闻之,莫不图计。日月既满,生一莲花,花有千叶,叶坐一子。余妇诬罔,咸称不祥,投殊伽河,随波泛滥。乌耆延王下流游观,见黄云盖乘波而来,取以开视,乃有千子,乳养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胜,将次此国。时梵豫王闻之,甚怀震惧,兵力不敌,计无所出矣。是时鹿女心知其子,乃谓王曰:“今寇戎临境,上下离心,贱妾愚忠,能败强敌。”王未之信也,忧惧良深。鹿女乃升城楼,以待寇至。千子将兵,围城已匝。鹿女告曰:“莫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谓曰:“何言之谬?”鹿女手按两乳,流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于是解甲归宗,释兵返族,两国交欢,百姓安乐。(《大唐西域记》卷七)^③

由法显、玄奘二书,乃可确定此一故事流传之区域,在法显所谓“毗舍离城”与玄奘所谓“吠舍厘国”,实为同一地域。^④

更可注意者,《法显传》成书较《杂宝藏经》译出为早。《杂宝藏经》之译年,据

① 参拙作:《从“烈士传说”到“杜子春”故事》,《民间文艺季刊》1987年4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又见拙著《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第七章第二节《从“烈士池”到“杜子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③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4~595页。

④ 参拙著:《佛教文学》第四章第三节《僧侣传记中的传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与《付法藏因缘经》、《方便心论》等“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释昙曜译出，刘孝标^①笔受。”^②而《法显传》之成，卷末曰：“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是岁甲寅。”^③此是《法显传》初次成篇。书后更有跋语：“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慧远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④是为二次增补。^⑤义熙十二年（416年）先北魏延兴二年（472年）半世纪以上，是则《法显传》所载印度当地流传的故事，较作为佛教经典的《杂宝藏经》记载者，输入中土更早，显示佛教乃至印度文化通过口头途径传输的重要性。

由此，值得进而追问：中土西行求法僧人如法显、玄奘等沿途听闻的佛教文学情节，是如何为旅行僧人所知，进而载入行记之中的？或曰：中古时代之西游僧人，旅行途中的语言传译问题究竟是如何解决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当时西游僧人自己的记叙看，语言交际在他们似乎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法显传》记其抵释迦牟尼传教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祇洹精舍：

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从何国来？”答曰：“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⑥

这当然是富于情感的场景，但读者不禁要问：既然祇洹精舍的印度僧侣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和尚，他们不通汉语是可想而知的；而法显等的印度语言知识也不会流利，^⑦他们之间的这番对话是如何进行的呢？

二

首先，出发西行之前已有学习。

中古时期，中国本土对于梵文绝非一无了解。不论那些来到中国的西域及印度僧人，即中国本土土人也颇有具备一定梵语知识者。《世说新语·政事》：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

① 此刘孝标即：《世说新语》之注者，《南史》卷四十九载：“居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既而还俗。”刘之任译经“笔受”，当值其为僧期间。陈垣曾有《云冈石窟译经与刘孝标》刊《燕京学报》（1929年），以为刘注《世说新语》“受其在云冈石窟时所译《杂宝藏经》之影响”。

② 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2~63页。

③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④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⑤ 文献记载，《法显传》有不同名称，《水经注》或作《法显传》或作《法显行传》；《隋书·经籍志》分别标作二卷、一卷。《法显传》经两次成书之过程，或许即是造成其两本有详略之别的原因。

⑥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⑦ 法显之着力学习梵文、梵语，是在此后的摩竭提国的巴连弗邑，见后文引。

胡人前弹指云：“兰闍，兰闍。”群胡同笑，四坐并欢。^①

“兰闍”，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以为：“或为梵语之 ranja，此云乐也。”^②

《冥祥记》中记载了晋王练幼年通胡语梵文的异闻：

晋王练，字玄明，琅玕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梵沙门，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生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之奇珍银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梵，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云。^③

转世之说或不可尽信，如王练果然幼而“能言，便解外国语”，大概是有一定的语言环境所致。王练之父王珉，对佛教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世说新语·文学》即有如下故事：

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即于坐分数四有意道人，更就余屋自讲。提婆讲竟，东亭问法冈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弥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当小未精核耳。”^④

即使这则记述或有误，^⑤但仍有材料可证王珉对佛学宿有钻研，据《高僧传》卷一，他“师事于”“帛尸梨密多罗，此云吉友，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这位高座上人，在当时来中土的西方僧人中有一个特点，“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语言，密虽因传译，而神领意得，顿尽言前”。^⑥不妨设想，王珉面对高座上人时，当常常聆听其胡语梵言。如此多种语言交错的情形，并非鲜见。《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记鸠摩罗什与觉贤辩“空”曰：

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⑦

是则鸠摩罗什、觉贤之辩论，非出诸汉语，需经宝云译语，众人乃得了解；至于宝云堪任传译，以其尝游西域、天竺，能通胡语。

之后，谢灵运因参与《大般涅槃经》的修治，对其中《文字品》有所研究，成《十四音训叙》，《高僧传》卷七《慧叡传》：

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音义诂训，殊方异义，无不毕晓。后还憩庐山，俄又入关，从什公谘禀。后适京师，止乌衣寺……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谘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着《十四音训叙》，条列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② 《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③ 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宿命篇”引《冥祥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22～823页。

④ 《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⑤ 程炎震曰：“僧弥，王珉小字也。《晋书》珉传以取此事。然珉卒于太元十三年。至隆安之元，首尾十年矣。《高僧传》作王僧珍，盖别是一人。因珍弥二字，草书相乱。”（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43页引）

⑥ 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30页。《世说新语·言语》于此亦有记载：“高坐道人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⑦ 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1页。



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①

亦是著名而典型的例证。^②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有《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一篇,论及梵文多多,如谓:

梵书制文,有半字满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汉文“月”字,亏其傍也。所以名满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圆满,犹汉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恶义,以譬烦恼;满字善义,以譬常住。又半字为体,如汉文“言”字;满字为体,如汉文“诸”字。以“者”配“言”,方成“诸”字。“诸”字两合,即满之例也;“言”字单立,即半之类也。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缘有半字,得成满字。^③

论及梵文作为拼音文字的特性。此文以日本兴膳宏教授的意见,或出刘勰之手。^④兴膳氏之说即或不能成立,至少刘勰是了解梵文的这一特性的。且《文心雕龙·声律》所谓“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⑤云云,“和”、“韵”之对比,如若对照慧皎《高僧传》“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⑥之论,则可知其有取于梵、汉语言之比较研究也。^⑦刘勰之具梵文知识,更有疑乎?

与佛教有因缘之士人已然如是,则僧人之习学梵文,更是当然之事。本土僧人之习梵文,早有先例,如晋“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博涉多闻,善通梵汉之语,尝译《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注《首楞严经》,又有别译数部小经”。^⑧至于玄奘,《续高僧传》记载:“顿迹京皋,广就诸蕃,遍学书语;行坐寻授,数日便通。”所谓“广就诸蕃,遍学书语”,准确的理解是:玄奘利用长安各族聚居的优越条件,学了多种西域语言和文字;当然,这中间应该包括了梵文,但不会仅限梵文。玄奘大约真的具有语言天才,所以于各语言“数日便通”,恐怕也未必绝无可能。

至于史料中明确记载西行僧人事先学习梵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的玄照可为一例:

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⑨

① 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9、260页。又参王邦维《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国学研究》第三卷。

② 中古僧众习学梵文之文献,据周一良先生意见,有悉昙类及字典类(《中国的梵文研究》,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如传鸠摩罗什所撰《通韵》及义净《梵语千字文》,皆是当时人研习梵文的实证。

③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宝云法师传》,苏晋仁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页。

④ 兴膳宏:《〈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⑤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1~432页。

⑥ 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7页。

⑦ 参拙著:《佛教文学》第五章第四节《中古诗歌形式成熟的佛教媒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⑧ 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27页。

⑨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页。

又如《宋高僧传》卷三《智通传》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他西游天竺,但他因有意远游而学习梵文梵语:

隋大业中出家受具,后隶名总持寺。律行精明,经论该博。自幼挺秀,即有游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①

玄奘的准备较之玄照、智通等更充分,因为仅仅梵语,在西域还不完全够用,它尚不能算通用语,而只是在特定的即佛教僧侣阶层中流行,对此,说得最清楚的要数《法显传》,法显提到:

至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②

如果要举类似的情形,大约相当于中世纪的欧洲,“俗人”说各自的俗语,而僧侣们中间则通行拉丁语吧。

法显从鄯善西北行,接着就是焉夷国(今新疆焉耆),^③正是《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的“阿耆尼国”。玄奘的记述或可说明,何以僧人中梵文通行:

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翫之。^④

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⑤

这两国的文字取法于印度文字,^⑥而佛教的“经教律仪”也一准印度,故而直接就其原文研习佛经典籍。

玄奘除了梵文之外,既“广就诸蕃,遍学书语”,且在行程途中“游践之处,毕究方言”,^⑦那才能应付裕如。^⑧

多种语言准备的重要性,在以下的例子中或许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出三藏记

① 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页。

②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③ 或作“乌夷”,此从章巽《法显传校注》之校订。

④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页。

⑤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

⑥ 对此一语言的研究,历来有不同的意见,或称吐火罗语,或分析为龟兹、焉耆高昌两种方言,参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2页的注说。

⑦ 于志宁:《序》,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页。

⑧ 旅行途中跨越多国不同的语言环境,而需有所准备,历史中不乏其例。日本古代遣唐使是赴中国唐朝的具有特定外交使命的使团,“是按照律令制下的官府规模组建的一套有专职的政府机构”(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郑威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其中各色人等就包括了“译语(按:指汉语翻译)、新罗及奄美(按:指琉球群岛北部之奄美群岛)等语翻译”(同上,第11页)。之所以要有新罗语翻译,是因为前期遣唐使的航路“一般经由北路,即先从北九州의 博德启程,经壹歧、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由陆路向都城长安进发”(同上,第7页);而需要奄美语翻译,是因后期遣唐使“航路改走南路,南路是指从博德出发,经五岛列岛,然后直接横渡东海,并抵达长江(扬子江)沿岸这一线路”(同上,第9页)。

集》卷九记《贤愚经》之成书：

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既而踰越流沙，贵到凉州。于时，沙门释慧朗，河西宗匠，道业渊博，总持方等。以为此经所记，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载善恶；善恶相翻，则贤愚之分也。前代传经，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号曰《贤愚》焉。^①

其中“胡音”是比较含混的表述，或者包括了梵文和当地的语言，而昙学等僧人的语言已经有相当的程度，如果不是通习胡语，则如何能“随缘分听”、“各书所闻”？进而，《贤愚经》如何能够集成？

三

其次，旅行中的语言沟通，有几种可能途径。

第一，与商人同行，因而可以获得语言的支持^②。比如，法显之返程即乘“载商人大舶泛海”而归的。这些商人不少是外国人，其中通行的语言并非汉语，如法显回国，抵达中土岸边，遇到两位中国猎人，“令法显译语问之”。^③后来义净赴印，也是乘坐商船，他离开佛逝（今印度尼西亚之苏门答腊），不久“至裸人国”，“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④可见与之同行者商人为主。往来中土与西域之间的商人，族属及经历复杂，具有丰富的多种语言经验，对于同行僧侣之实际交际当有极大帮助。

第二，与使者同行，这些使者一定有相当的语言准备，而其所抵之国，也会有一定的迎接安排。《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涉及这方面的材料颇多：

复有一人，与北道使人相逐至缚渴罗国，于新寺小乘师处出家，名质多跋摩。……少闲梵语。覆取北路而归，莫知所至。传闻于天竺之僧矣。^⑤

僧伽跋摩者，康国人也。少出流沙，游步京辇。禀素崇信，戒行清严，檀舍是修，慈悲在念。以显庆年内奉敕与使人相随，礼觐西国。^⑥

后条中之“使人”即三次使印之王玄策也。

早先的例证，以北魏时惠生与宋云赴北印度为著。《洛阳伽蓝记》卷五：

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

①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1页。

② 季羨林曾撰：《商人与佛教》一文，讨论印度佛教之传布、发展与商人之关涉，载《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章巽：《法显传校注》“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④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2～153页。此一情节似可比拟《庄子·逍遥游》中“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故事。

⑤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1页。

⑥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3页。

部,皆是大乘妙典。^①

他们一路的资费相当充足:

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罗,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②

乌场国……城北有陀罗寺,佛事最多。浮图高大,僧房逼侧,周匝金像六千躯。王年常大会,皆在此寺。国内沙门,咸来云集。宋云、惠生见彼比丘戒行精苦,观其风范,特加恭敬。遂舍奴婢二人,以供洒扫。去王城东南,山行八日。如来苦行投身饲饿虎之处。高山巖崿,危岫入云。嘉木灵芝,丛生其上。林泉婉丽,花彩曜日。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于山顶造浮图一所,刻石隶书,铭魏功德。^③

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④

这些显然都不是一般西游僧人可以负担的,以其具备国家使者之身份而使然:

至【歌】哒国……王着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见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诏书。至于设会,一人唱,则客前,后唱,^⑤则罢会。唯有此法,不见音乐。^⑥

入乌场国……国王见宋云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闻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⑦

入乾陀罗国……宋云诣军,通诏书,王凶慢无礼,坐受诏书。宋云见其远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责之。王遣传事谓宋云曰:“卿涉诸国,经过险路,得无劳苦也?”宋云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远求经典,道路虽险,未敢言疲。大王亲总三军,远临边境,寒暑骤移,不无顿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国,愧卿此问。”宋云初谓王是夷人,不可以礼责,任其坐受诏书,及亲往复,乃有人情,遂责之曰:“山有高下,冰有大小,人处世间,亦有尊卑。歌哒、乌场王并拜受诏书,大王何独不拜?”王答曰:“我见魏主则拜,得书坐读,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书,犹自坐读,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读书,于理无失。”云无以屈之。遂将云至一寺,供给甚薄。^⑧

①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②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220页。

③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03页。

④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及220页。

⑤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或疑为‘复唱’之误。”

⑥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6页。

⑦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⑧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211页。

北魏诏书的交接,是宋云和惠生政治身份最明确的表征。因为是国家使者,因而语言交际上,自然有安排,所谓“解魏语人”、“传事”之类,即可以通译的专门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宋云和惠生对于沿途的语言变化,颇为留心,如:

吐谷浑……其国有文字,况同魏^①。^②

朱驹波国,人民山居,五谷甚丰,食则面麦,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

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③

《洛阳伽蓝记》引《道荣传》^④记那竭城附近

有山,山下有六^⑤佛手作浮图,高十丈。云此浮图陷入地,佛法当灭。并为七塔,七塔南石铭,云如来手书,胡字分明,于今可识焉。^⑥

慧超《往五天竺传》、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此类例子亦颇多焉。慧超乃新罗人,无论在中土还是西行途中,皆为异乡人,始终处在异国语境之中,对此的敏感可是想见;而玄奘西行前曾于“诸藩”之语言文字“遍学书语”,关切且能有所认识也是自然的。此处仅举后者卷一中的若干例:

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⑦

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⑧

跋禄迦国……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⑨

窰利……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⑩

覩货逻国……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窰利。^⑪

梵衍那国……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覩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⑫

迦毕试国……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⑬

第三,是如前引《法显传》所示,可与僧人交流,以求得帮助。《法显传》中亦有实例,在王舍新城准备拜访耆闍崛山:

其山峰秀端严,是五山中最高。法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上耆闍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收泪而言:“佛昔于

①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今各本作‘况同魏’,显有脱误,‘况’盖‘冠’字之讹,‘冠’上疑又夺‘衣’字”,“疑为‘衣冠同魏’之误”。

②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③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④ “道荣”,或作“道药”,道宣《释迦方志》卷二:“后魏太武末年,沙门道药从疏勒道人,经悬度,道僧迦施国,及反,还寻故道,着传一卷。”

⑤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以为当做“七”。

⑥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⑦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页。

⑧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

⑨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

⑩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⑪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⑫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页。

⑬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页。

此住，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还向新城。^①

就得到了两位“旧比丘”的帮助。这样驻寺的僧人款待游方僧的情形，很普遍，《法显传》中即记叙中印度的僧俗：

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床蓐、饮食、衣服，都无缺乏，处处皆尔。众僧常以作功德为业，及诵经、坐禅。客僧往到，旧僧迎逆，代担衣钵，给洗足水，涂足油，与非时浆。须臾，息已，复问其腊数，次第得房舍、卧具，种种如法。^②

当时的天竺，据义净的记载，各国往往建立自己的寺院，以便僧人安居，而中国当时却没有，“诸方皆悉有寺，所以本国通流。神州独无一处，致令往还艰苦耳。”^③因而他感慨：

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遂使流离蓬转，罕居一处。身既不安，道宁隆矣！^④

中国僧人原来也曾有此类寺院：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踰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唐云鹿园寺也。）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河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弗咄罗，唐云天子也。）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河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诚可叹曰：虽有鹊巢之易，而乐福者难逢。必若心存济益，奏请弘此，诚非小事也。^⑤

后义净回抵南洋时，乃请天津禅师返唐，“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⑥

不过即使“大唐无寺”，在他国的寺庙中也还是可以得到帮助，《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大觉寺西有迦毕施国寺，寺亦巨富，多诸硕德，普学小乘。北方僧来亦住此，寺名窣拏折里多。唐云德行。^⑦

慧轮师者，新罗人也。梵名般若跋摩。唐云慧甲。自本国出家，翹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奉敕随玄照师西行，以充侍者。既之西国，遍礼圣踪。居庵摩罗跋国，在信者寺，住经十载。近住次东边北方覩货罗僧寺，元是覩货罗人为本国僧所造。其寺巨富，资产丰饶，供养殄设，余莫加

①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②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页。

③⑤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3页。

④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⑥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7页。

⑦ 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2页。